

# 包圍中國： 英國尋求戰爭

林登·拉魯旭

編者按：伴隨著日前來自多種媒體和智囊團的對中國的攻擊，《全球戰略通訊》登載林登·拉魯旭1996年11月的文章『中國的包圍圈』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拉魯旭在此聚焦于一個典型的侵略成性的英帝國導演的對中國主權的對抗，這就是所謂的“釣魚臺群島”事件。同樣的事件是今夏他們編導的反映各式各樣智能庫的“分析”，即日本和韓國的右翼組織將要借日軍侵佔東北60週年之際登臺作許多表演。可想而知此種演出會與中國大陸收回香港正巧重合。

重新當選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當前面臨許多美國的對外政策危機，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給前總統喬治·布什卒一記耳光：這一次是美中關係問題。如果撇開幻覺，當今世界上除了美國和中國的所有國家都正處於其民族—國家形態的早期瓦解過程之中。除非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緊密合作，及時採取措施防範這一全球性的災難，否則這一瓦解的勢頭將不可避免。如果没有中國的合作，美國可能無法防止行將到來的全球性民族—國家一個接一個倒塌。這一倒塌的過程起因于現正不斷加劇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如果在這之前沒有十分強烈的預防措施，倒塌將勢在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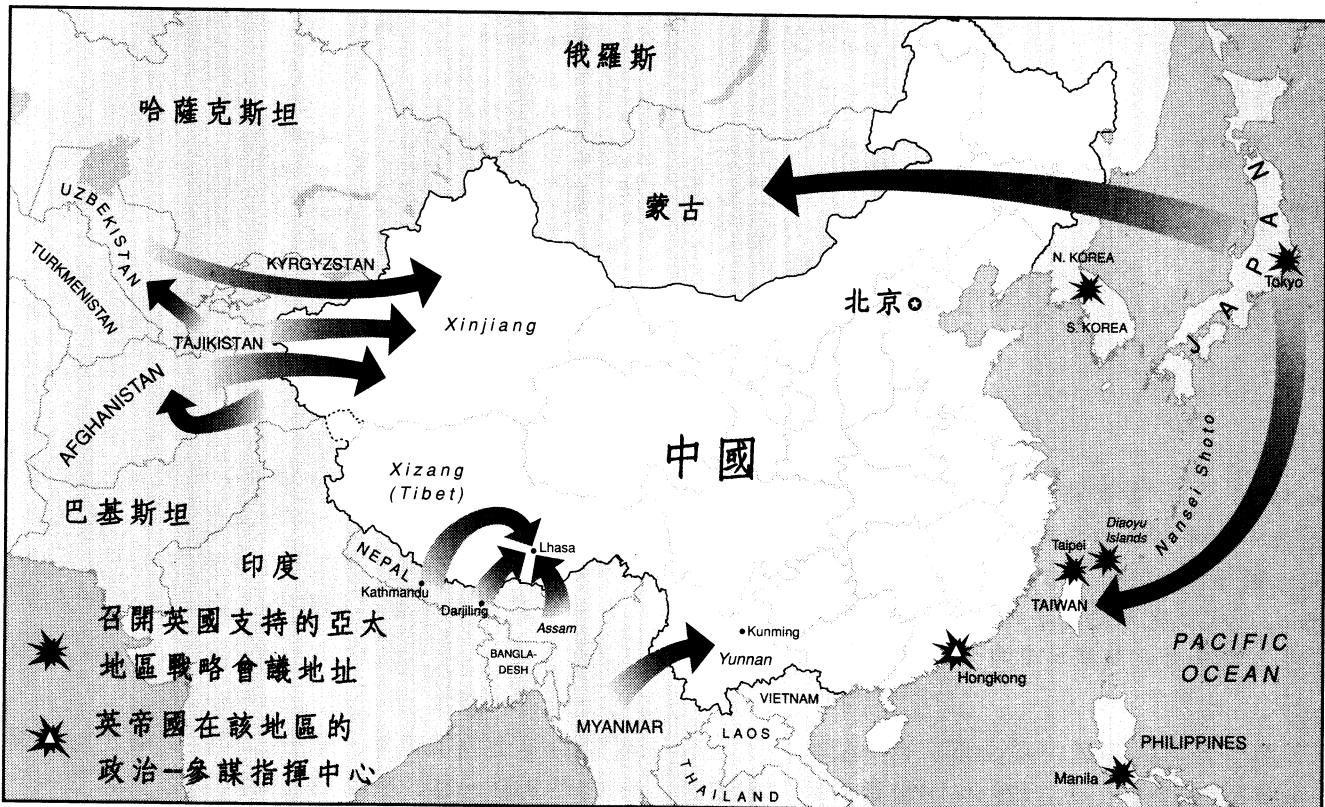
在這方面，英國官方反復聲明，倫敦決心要瓦解中國，其中典型的說法是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吉拉德·塞格爾（Gerald Segal）所做。一九九六年春，英國的里昂·布裡田（Leon Brittan）爵士也發出了同樣的威脅。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客人于五月七日在中國政府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這樣做的。布裡田威脅會議主人說，如果中國不終止其政府對修建連通西歐和中東的“歐亞大陸橋”鐵路的承諾，中國的環境將遭致戰略上的不穩定。這一顯然代表英國外交界

觀點的紳士倒很直率，他不像那些習慣于背信棄義的外交官一樣，在剛剛在泰國曼谷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還只敢隱諱地就這個和其它問題動員南亞和東亞國家來對抗中國。（1）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戰略利益遭到威脅，原因是英國外交及其情報機構主持協調採取了一系列包圍中國破壞穩定的行動。（見圖一）這些由英國挑起的熱點包括英國的“普什圖尼斯坦”派發起的塔裡班戰役，烽火燃及阿富汗、克什米爾和巴基斯坦。這還包括英國糾集的旨在推翻緬甸現政府的行動，其借口還是常用的、但也定義不確的“人權”。這還包括誘使日本自視為一個政治霸權國家，可以把中國北部（和蒙古）從中國中央政府手中奪取過來。還有，倫敦及其在美國共和黨內的代理人反復再三地破壞南北朝鮮之間艱難的和平進程。還有在這幫共和黨人喧囂于最近建立起來的“自由亞洲電臺”。

在這種背景情況下，英國情報機構利用白宮注意力轉向美國大選這一時機，發起了一系列削弱美國太平洋利益的事件。這些事件要求美國優先採取糾正行動。下文中，我們將集中討論大英

圖一：英國支持的反華的敵對戰略



帝國主義企圖削弱中國主權完整的一次事件，即所謂“釣魚島”事件。

一九九六年七月到十月期間的這場外交風波，從表面上看是中國和日本對位於台灣東南一百六十公里、被稱為釣魚島（2）的八個島嶼的歸屬有不同意見引起的。爭端的起因是與文鮮明教團有聯繫的日本右翼組織在島上興建燈塔。正如大家注意到的一樣，這次事件只不過是越來越明目張膽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一個，其意圖全都是英國外交機構公開宣佈的地緣政治目的，即把中國分裂為一群互相爭斗的“軍閥”割據國家。這次事件在中國人民中間掀起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其原因就是日本對這些島嶼的主權要求最早也只是在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五年間提出的，而且這些主權要求的歷史依據只不過是日本對中國發起的兩次殖民主義侵略戰爭。

與慣常情況一樣，在這些倫敦導演的事件中，釣魚島事件也是倫敦與美國共和黨內一幫令人可疑的無賴合謀而成。這幫無賴屬於共和黨的“國際共和黨協會”，直接參與損及美國在俄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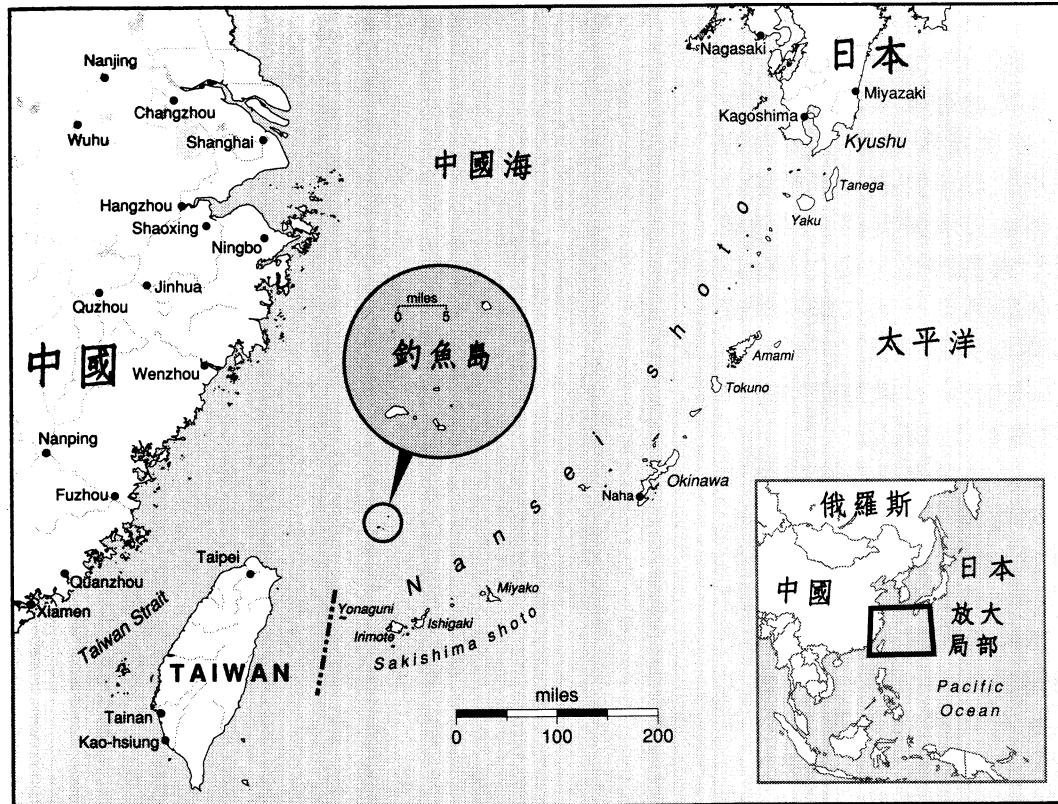
利益的活動。這幫人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得到文鮮明教團資助的喬治·布什和他那以日本為基地的兄弟普雷斯特·布什（Prescott Bush）。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爵士也像以前一樣支持英國的這一地緣政治行動。

由於我們在這裡指出的這些原因，美國政府只有公開警告英國美國不會容忍現在這場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包圍，否則，美國將失去能力，無法部署一種保衛美國重要全球利益的有效外交政策。就此起見，我們將在這裡簡要談一下七月到十月間釣魚島事件的緣由。

####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的回聲

首先，為了更好地了解英國動用其右翼資產的情況，讓我們看看普雷斯特和喬治·布什在日本的文鮮明教團關係。

一九八九年在裕仁天皇最後一次患病的消息公佈之後不久，本文作者對其學識和獻身精神懷有崇高敬意的日本的幾個重要人物，分別但基本上在同一時間給天皇發出警告。這些警告有一共



同的內容，即我們這些美國的愛國者必須立即採取行動，阻止英國在三十年代的故伎重演。當時的這些伎倆導致軍國主義統治了日本的政治生活，這又促成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對珍珠港的進攻，儘管美國在其針對英日聯合對美國發起侵略戰爭的作戰計劃中早已料到了這一點。

本文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日本會再次蹂躪珍珠港，但是英國的行動會再次導致有損于日本和美國重要利益的後果。

這些警告及其蘊涵的意思都有錄在案，但不幸的是喬治·布什當時已是美國總統。

讀者應該知道，從本世紀初到三十年代中期，美國軍事部門有兩個戰爭計劃：“橙色戰爭計劃”和“紅色戰爭計劃”。計劃的目的是防備英國和日本聯合對美國發起海上進攻，因為在二十年代海軍軍備裁減談判之後這被認為是可能的。預料之中的日本對珍珠港的海軍攻擊，是這兩個美國戰爭計劃的主題，也是英國煽動的敗壞“比利”·米歇爾（"Billy" Mitchel）將軍名聲、嘲笑他先見性警告（3）的主題。

一九八九年，天皇（他曾在一九四五年初通過梵蒂岡渠道尋求與羅斯福總統的美國媾和）即將去

世（4），這一事件正好與八十年代期間二次世界大戰一代的謝世相重合，代之而起的是戰後一代，他們在歐洲、美洲和日本的政界、商界、教育界和學術界佔有領導地位。這不僅僅是換崗，從一代人換到下一代人，儘管這是產生危險的根源。在美國和日本，強加在戰後一代身上的戰後文化扶持了一種心態，它廣泛強調赤裸裸的自我中心主義、存在主義論的“唯物主義”。這樣的哲學觀念對一個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潛在的自殺，因為這樣的的文化墮落普遍存在於當今的高級決策者當中。

在這一世代交替的過程中，由於英國外交資產亨利·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的卡特政府、裡根時代的“廣場協議”和喬治·布什政府的持續幫助，英國對日本政策的影響加大，從而越來越危及到日本的重要利益，同時也招致對美國戰略利益的危害。正是這種英國的影響，正是文鮮明教團資助的喬治·布什的關係，滋養了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上的挑釁。

在美日關係史上，日本青年組織的長篇大論無外乎都是重複英國在決定日本自身政策方向上的影響，如日本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第一次

中日戰爭期間的中國政策，倫敦在推動一九三一年第二次中日戰爭中起的作用。本文作者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認識的日本高級領導人應該像麥克阿瑟將軍那樣認識到，自從美國海軍上將佩裡（Perry）指揮的著名輝煌的戰役打破大英帝國在遠東的一統天下以來，每當日本與英國合謀破壞美國利益之日，就是日本遭到慘重損失之時。以前一代的領導人曾經預先警告過日本文鮮明教團支持的流氓無賴促使日本與英國連伙，打擊十二億中國人，這對中國造成的威脅超過對日本造成的威脅，日本自身也不得容忍這些流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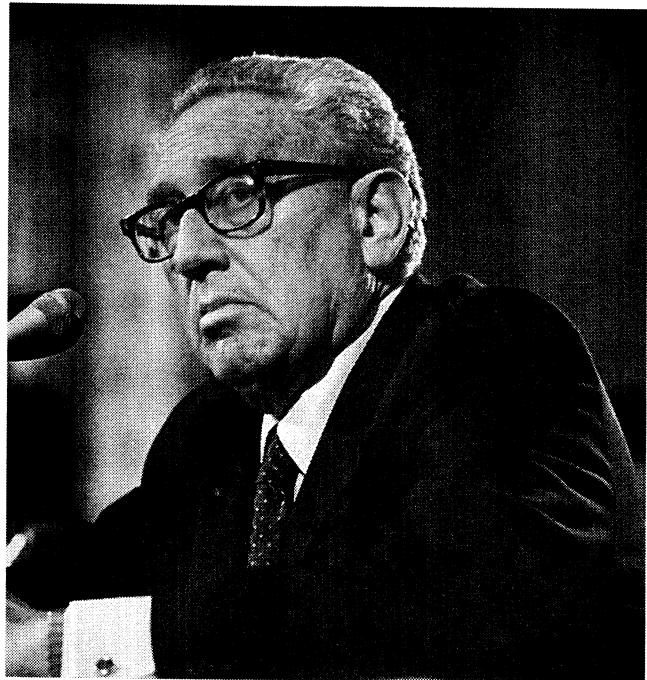
就這次事件而言，正是在里昂·布裡頓爵士五月七日北京講話的戰略背景下，一九九六年七月至十月釣魚島事件爆發。由文鮮明教團支持的世界反共同盟也策劃了一次與之相關的事件。該同盟與前副總統喬治·布什合謀讓布什控制八十年代中期的尼加拉瓜游擊隊販毒活動。這一由文鮮明教團支持的日本極右青年組織發起的事件，牽涉到文鮮明教團資助的英國資產喬治·布什爵士和布什爵士在遠東的兄弟普雷斯科特。世界反共同盟掀起的宣傳活動是短暫地佔領釣魚島中的一個島，由右翼青年組織豎起一座燈塔，掛上日本國旗，與六十五年前誘發第二次中日戰爭的臭名昭著的“沈陽事件”如出一轍。

值得注意的是，從一九七八年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到英國代表人物里昂·布裡頓爵士一九九六年五月七日北京講話提出的帕梅斯頓（Palmerston）外交手段之間，中國和日本關於釣魚島主權問題的爭端一直處於靜止狀態。在一九七八年北京和東京外交關係正常化時，雙方同意把釣魚島的主權問題擱置起來留待將來解決。當時的討論結果是，也許應該謹慎地把這一問題留給后代在雙邊關係自然改善之後加以解決。

正如我們在下文中揭示的那樣，日本自身的利益再次由於其政府未能制止文鮮明教團的喧囂挑釁而受到危害。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有義務立即清除這一危險的混亂局面，因為美日安全條約允許這樣做。

### 無處不在的“奇戀博士”

如要明白釣魚島爭端，我們必須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該事件極其發生時間僅僅是英國導演



亨利·基辛格，所謂的中國之友，在一九七一年美日沖繩條約會議上講話。基辛格在華盛頓的朋友們的強意解釋是，根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六〇年美日修正條約的前提，美國不得不干涉沖繩事務，增加日本防務。

的一系列旨在中國週邊國家製造麻煩的戰略聯合行動中的一環。不過，這一事件本身也必須加以分析並予以解決。要了解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必須“重看到恬不知恥自稱為英國外交特務的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爵士的作用（5）。

就像在一場艱苦的勞工糾紛中工會組織者遭受毒打一樣，雖然要明白腿是怎麼打斷的必須考慮糾紛前因後果，但是斷腿本身必須得到適當的治療。

一九九六年九月三十日，有關事件根源的一個關鍵證據公佈于眾：釣魚島這一政治定時炸彈埋藏于一九七一年美日沖繩群島條約的會談記錄之中，埋藏之人就是英國的亨利·基辛格爵士，他在“白宮轉世”而成為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根據今天還身為華盛頓官員的基辛格走卒的解釋，一九七一年美日沖繩群島條約的基辛格會談記錄使美國上了圈套，規定美國要

依據一九五一年簽署、一九六一年修訂的美日安全條約代表日本軍事介入釣魚島爭端。

基辛格在設置現在這場爭端中所起的作用，是由基辛格在一九七一年的合謀者揭露的，他是拉利·尼科希（Larry Niksch）博士，現在是美國國會研究局的亞洲問題專家。

在這份九月三十日的政策報告中，尼科希談到他在一九七一年作為基辛格助手把這份劇毒會談記錄塞進沖繩群島條約中所起的作用。尼科希強調了反映日本的釣魚島主權主張的會談記錄與一九五一年簽署、一九六一年修訂的美日安全條約之間那種危險的“奇戀博士”關係。其它文獻也揭示一九七一年的會談記錄與一九五一年簽署、一九六一年修訂的美日安全條約之間的聯繫程度也許並不適當（6）。但是，尼科希—基辛格的文本激怒北京譴責尼科希的解釋是玩戰爭之火。歷史的事實是：中國表達的擔心是證據確鑿的。

## 日本的重要利益

如果以一個國家適宜居住土地的人口密度及其主要資源來衡量，人們應該清楚，日本只有集中開發科學技術發展生產能力才能夠生存，只有不斷發展成為“知識工業”出口國才能夠生存。同時，它也必須成為高技術機床及其它高技術產品的供應國，滿足不斷擴大的市場、尤其是廣大的具有極大潛力的亞洲市場的需求。

如果日本在（尤其是）太平洋—印度洋地區起不了這樣的作用，它就將像三十年代那樣通過濟狀況逼迫日本發動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間的第一次中日戰爭和侵佔朝鮮，是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經濟環境促使日本發動第二次中日戰爭。

簡而言之，如果日本不能不斷擴大出口其高技術產品，它也就無法購買其國內無法提供的初級原料和其它初級商品。現代日本必須通過進口來求生存。如果日本不能購買，它就只好去偷。尤其是現在，全球的金融泡沫經濟（自七十年代以來美國和其它國家政府把日本推入了這種泡沫經濟）行將崩潰，日本把純投機經濟視作海外購買能力之源泉的時代即將結束。如果日本採取從鄰國中竊取勢力範圍的政策，而不是採取知

識密集型經濟的政策，那麼衆所週知的目標將是日本的東亞週邊國家（7）。由於向中國發動新挑撥而不可避免帶來的日本自毀也是完全可以預料的；莎士比亞筆下的漢姆雷特步入預示的結局也就是他的最終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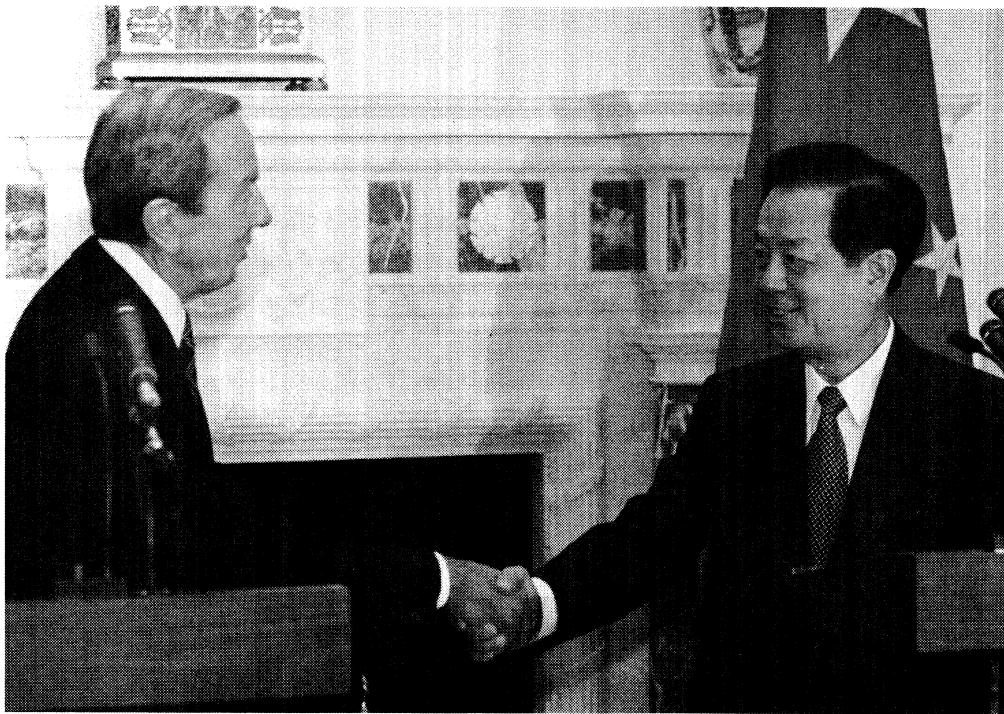
因此，日本唯一明智的決策是重新調整其方向，採取知識密集型經濟的政策。日本在世界各地沒有真正的朋友，因為這些國家都承諾要放棄自殺性的“後工業化”烏托邦政策，轉而採取扶持發展實物生產能力的政策。這種發展只有通過大規模發展基礎經濟設施、採取向科學技術傾斜的工農業高投資的保護主義政策才能夠實現。

最近二十五年來，日本的最大問題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知識密集型經濟的方向遭到兩方面的破壞：一是一九七一年之後“浮動匯率”世界貨幣體系，它把全球經濟驅入“後工業化社會”和“全球自由經濟”的烏托邦幻想之中，二是在卡特總統、裡根總統和布什總統之下的美國拼命打擊日本在第三世界國家享有的高技術產品供應國的地位（8）。到目前為止，克林頓總統在第一任期間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扭轉其前任在這些問題上的危險政策導向。

美國經濟和外交政策上的這一缺項必須在第二任期中加以糾正。否則，美國將不會有明智的日本政策和中國政策。不過，如果美國幫助中國和日本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它將給美國和所有東亞南亞民族—國家帶來巨大的福祉。

按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方向，它對高技術產品的進口需求實際上是無限的。中國必須在發展其基礎經濟設施（如水力、電力和現代鐵路網絡）上大力投資，才能夠創造實物經濟環境，提供高收入的工農業就業機會。在這樣的條件下，按勞均和地均計算的中國生產能力將可以是持續發展的，而且其發展速度將令人刮目相看。由之而產生的東歐亞大陸的飛速發展是日本未來文明的基礎。

有些不同意我們樂觀主義觀點的人也許會認為，如果世界上沒有現在這種不斷加速的金融崩潰和經濟瓦解，前面所述或許還有些可能。對這種不同意見我們的看法是：如果不立即採取激進措施做出這樣的政策轉向，那麼這個星球上將沒有任何國家能夠作為一個政治實體而幸存到本世



中國付總理兼外交部長  
錢其琛在白宮會見美國  
國務卿克利斯托福。

紀末。這樣的政策轉向要求回到在主權民族－國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農工生產體系，而這些民族－國家的首要任務是通過政府的力量大規模發展基礎設施，扶持擴大就業規模，提高農業和工業勞動力的實物生產能力，而所有這些任務都只有依靠大力投資發展科學技術來實現。

#### 別了，華盛頓的矇騙

今天，對美國以至對世界的最大危險不是金融體系瓦解爆炸，不是經濟崩潰，不是暴亂、恐怖活動或戰爭。對人類生存攸關的最大威脅是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代：一九九六年以前以實物生產為中心的成功的農工文化，已經被肯尼迪之後的所謂“新世紀”所取代，而這種“新世紀”只不過是從本質上講已經破產的“後工業化”烏托邦，是對消費為重的“娛樂社會”的頂禮膜拜。在這種“新潮”下，人類文化嚴重退化，華盛頓官方的習慣做法是沿用二手車推銷商的伎倆，強調的是“銷路好”，而不是“有作用”。

對大多數華盛頓的官員來說，這是一個政治民意測驗的時代，是一個對羅伊·科恩（Roy M. Cohn）臭名昭著的婁羅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和羅杰·斯通（Roger Stone）之流進行民

意測驗的時代。我們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時代：銷路最好的政治是民意測驗者的喧譁，而不是測驗的結果。

這是“新世紀”最後的日子了。頭腦不平衡的人企圖來“平衡預算”（而實際上根本沒有平衡），方法是一方面削減稅收，一方面又要依靠稅收來支付平衡預算的開支！實際上沒有任何平衡聯邦預算的計劃，只有騙人的計劃，企圖欺騙（平衡），方法是一方面削減稅收，一方面又要依靠稅收來支付平衡預算的開支！實際上沒有任何平衡聯邦預算的計劃，只有騙人的計劃，企圖欺騙那些容易上當之人相信他們的謊言，相信通過的法案就是真正平衡預算的措施。在這裡，只有喧譁，沒有實際內容。不管這些民意測驗者總是告訴政治家們，受到矇騙的公眾相信的是這樣那樣，而決策者最有可能依靠的根據就是這些謊言。不管盒子裡面是否空空如也，只要有誘人的包裝賣得出去就行。

世界上的多數地方情況也基本上一樣。巴黎、波恩、莫斯科、華盛頓等等這些世界大國的首都，看來主要是熱衷于矇騙自己也矇騙國民，使用自欺欺人的言詞，既騙自己，也騙輕信

的大眾。這種現象在經濟問題及相關政策上尤爲突出。

這些世界首都中常見的矇騙說法是，以浮動匯率制全球主義爲標誌的後工業化時代取代了民族一國家。與之相關的另一種矇騙說法是，既然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或其他什麼人的精神決定了這些發展趨勢不可逆轉，那麼就沒有必要再做什麼事情來扭轉這些趨勢。這等於是告訴一個落水之人深深下潛，然後在那裡呼吸。這是一個由會計師和股票經紀人告訴醫生如何治病救人的時代；由之而出現的死亡被輕描淡寫爲“一段遺事”，白痴對謊言的盲目相信被認爲是對經濟政策的政治認可。

只有世界上的多數人對這些做法真正“心中有鬼”方能拯救我們這個文明。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任何能夠讓世界各國從當前危機中幸存下來的政策，都必然被認爲是世界各國所有民選政府官員智慧的羞辱，是對公衆輿論的羞辱。政府和人民現在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是願意被羞辱，還是被淘汰？

總的說來，問題的關鍵之點就在於此。

儘管有些人喋喋不休于“服務經濟”和“信息社會”，但是大多數人要依靠吃飯而不是吃話來過日子，他們需要穿衣，需要住在屋子裡（如果他們支付得起的話），需要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進行旅行，需要飲用安全（經過處理）的水，需要每年耗用相當于數百萬度電的能源，需要在學校教室（在冬天有暖氣）裡接受教育，等等。造成經濟貧乏（以及發病率和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不是信息的缺乏，也不是某種非專業服務的缺乏，而是缺乏物質產品，缺乏接受過高級專業訓練、從事教育、衛生、科學技術研究的專業服務人士。我們並不是生活在後工業化社會之中，而是生活在遭到破壞的工業社會之中。實際上，聯邦、州和地方預算中的所有不平衡和缺錢狀況，都是最近三十年來經濟決策上出現的四個愚蠢變化的結果：“新馬爾薩斯主義”的“後工業化”烏托邦、全球“浮動匯率制”、對貿易和基礎設施“解除管制”以及扶持金融投機。這些變化徹底違背了導致美國經濟早年獲得成功的那些政策：投資以提高接人平和地平計算的勞動力生產能力。

現在沒有“行將到來的經濟蕭條”；在收入和生產性就業方面的經濟蕭條已經有多年沒有發生了。但是，就人平收入的購買力而言，就每一美國就業人員的真正收入和產出而言，其水平只相當于二十五年前的大約一半。要達到二十五到三十年前同等工作的收入購買力水平，現在需要一個家庭有兩到三人同時從事該項工作。在這段時期中，美國經濟遭到掠奪，基礎經濟設施和其它設施年久失修。世界其它國家的情況還要糟糕得多。

在美國以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經濟蕭條已是多年的往事了。在美國已經出現併發展迅速的較新現象，遠比單單一場類似于美國三十年代大蕭條時的經濟蕭條更可怕，破壞更嚴重。

注意你的錢包，注意你的銀行存款憑據，看看你所稱爲的是錢是如何流動的。這些金錢交易中究竟有多少是用實際的錢來支付的？有多少金錢交易是通過信用卡或充斥市場的所謂其它“電子錢”來完成的？如果有一天電子錢流動樞紐的電子設備壞了，那麼將會對你、對購物中心的各個商店、對你的僱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你將如何從店裡購買食物？商店又如何補充其貨架？在這時，金錢和信用的流動實際上已經停止，除非總統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的授權採取嚴厲的“管制”措施來加以挽救。

我們距這一天還有多遠？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距這場大災難還有多遠？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米切爾·坎德蘇（Michel Camdessus）自己的話說，我們處於整個金融銀行體系全面崩潰的邊緣，這將是一場國際性的、呈鏈式反應的危機。危機已經到來，颶風的外緣已經抵達海岸，正在以全速向內地推進。

簡言之，一九六六年以前的農工社會模式在過去三十年中一步一步地發生轉向，這樣的政策轉變帶來災難性的錯誤。過去三十年中引入的所謂經濟政策“主流思想”和“新世紀”社會政策是一巨大的錯誤，一大騙局，一大災難。當今社會面臨的所有特大問題的根源，是華盛頓官方和當今多數大學校園稱爲的“主流”經濟思想。

如果這一“主流”思想在今後幾個月中佔到上風，你，你的家庭，我們的國家，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將遭受世界現代史上聞所未聞的大災。

難。解救的辦法是回到主權民族—國家和注重農工經濟發展的老原則的道路上。

因此，對人類來說，最大的威脅就是你們中的大多數人堅持認為，政策應該與你們相信“正在”考慮之中的東西相一致，不管是走進還是迴避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的選舉站。實際上當今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是這種情況。

政府不應該問其國民，政府的經濟金融決策方向應該如何。一個普通的公民不具備在這些問題上的專門知識。政府應該問其國民：政府的政策是否必須保障該國民及其家庭的生活？我們的政府是否應該領導全國或世界各國消除現在正不斷升級的全球金融災難？政府是否應該拋棄這些導致災難的政策，代之以現代史已經證明的成功政策？

在這樣的情況下，克林頓政府就應該領導美國回到美國財政部長亞力山大·漢密爾頓創造的“美國政治經濟體系”（9）這一經過歷史證明的道路來。這一體系經過亨利·凱雷（Henry Carey）的代表佩興·史密斯（E. Peshine Smith）而傳到日本，激發“明治維新”，使日本迅速強盛到與世界工業大國基本平起平坐的地位。我們堅持認為，世界的經濟必須重新定向，支持中國復興計劃中所瞄準的那些目標，支持日本得以作為知識密集型出口國而發揮其發展作用。如果美國能夠與中國和日本達成一致意見，在全球經濟政策上實現這一對大家有利的激進轉變，我們所面臨的其它問題將迎刃而解。

如果不這樣，魔鬼將認為我們是冥頑不化的蠢豬。

## 註釋

1. 見就一九九六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北京會議所寫的專題文章“北京提出歐亞發展的宏偉計劃”《主管戰略評論》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至於“另一個轉世”而為歐洲聯盟副主席的里昂·布裡頓爵士的發言“中國必須遵守‘自由貿易，原則’”，見該期雜誌的第20-22頁。

2. 見圖二。釣魚島，或稱釣魚臺島，在北京的地圖上稱作釣魚島，日本稱之為Senkaku島，由八個礁石島嶼組成，位於台灣東北一百六十公里。除個別地方而外，它與現今日本的領土琉球群島的距離也與到台灣的距離差不多。琉球群島是日本獲取的沖繩群島的一部份。釣魚島位於東經一百二十四度，北緯二十六度以下。自明朝（公元1368-1644）以來，釣魚島顯然是中國領土，用于捕魚和種植中草藥。這一狀況一直保持到日本打破明治維新時期與林肯總統、格蘭特總統、加菲爾德總統和詹姆斯·布萊恩（James Blaine）國務卿領導下的美國的聯盟關係，成為大英帝國在東亞的資產。日本在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五年間發動中日戰爭，在此期間于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日本天皇發佈命令把這些島嶼居于

已有。這一命令是日本首次對這些島嶼（其中也包括台灣島）提出主權要求的根據。日本在今天重新提出主權要求，根據是由長期以來一直執迷不悟的英國走狗亨利·基辛格爵士在二十五年前杜撰的口實。

3. 當這一事件在軍事法庭披露之時，米切爾對當時存在的美國戰爭計劃做了補充說明。他專門提到航空母艦的作用，說這可能給日本對珍珠港發動海上突然襲擊提供關鍵的新武器。即便是進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英國完全依靠美國的友好善意來維持生存的時候，英國仍舊繼續執行自美國南北戰爭以來的政策，企圖把美國的軍事力量削減到讓大英帝國感到放心的程度。其首要的目標就是不准美國的海軍力量發展到能夠與英國“無敵”（戰列艦）艦隊抗衡的程度。考慮到美國的海軍航空母艦有可能具有擊沉戰列艦尤其是英國戰列艦的能力，倫敦和美國的親英海軍將領們拒絕對海軍加以限制。因此，這也成了迫使柯立芝總統之前的美國向英日聯合海軍力量低頭屈服的議題。正是這一因素，使得美國、英國和日本這些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盟國差一點大動

干戈。在柯立芝一胡佛這些狂熱的特迪·羅斯福式親英集團統治之下，就連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這樣的愛國職業軍人也不能拯救米切爾，因為他對倫敦的指責造成了嚴重後果。

4.與杜魯門政府的宣傳不同，杜魯門總統在倫敦唆使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把美國核武庫中的唯獨兩顆原子彈扔在廣島長崎，但並沒有因之而減少美國的傷亡。無論有沒有原子彈，美國都沒有必要對日本本土發動進攻。由於美國成功地對日本實施了全面的海上封鎖，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裕仁天皇曾經尋求過的日本投降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5.基辛格曾經恬不知恥地公開宣稱，他是站在兩屆美國總統之後代表英國外交利益的代理人。他在任職尼克松總統和福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期間，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在倫敦發表紀念英國外交部在其第一任大臣、帕爾梅斯頓的支持者杰裡米·本森 (Jeremy Bentham) 領導下建部二百週年的主題演說，題目是“夥伴關係回顧”。基辛格說：“…在我任職白宮期間，我向英國外交部的通報的情況超過我向美國國務院通報的情況，我與英國外交部的關係超過我與美國國務院的關係。”

6.比如，羅杰·斯達爾 (Roger Starr) 作為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的法律顧問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曾致函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斯達爾在有關基辛格沖繩條約的聽證會上告訴委員會

說，會談記錄有可能引起日本、台灣和大陸中國的爭議。斯達爾寫到：“中華民國和日本的政府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存在異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聲稱對其有主權。美國認為，把這些島嶼的行政權交還給日本絕不會是偏袒任何一方的要求…任何有爭議的要求將是由有關各方進行解決的問題。”

7.包括但並不局限於中國北部、蒙古和前蘇聯的有關地區。

8.從七十年代以來有兩件事情可以說明這一問題。第一，當英國代理人基辛格主管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時，英國（以及基辛格）決心摧毀伊朗國王巴列維，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巴列維犯下滔天之罪，與德國和日本達成以石油換技術的協議，企圖把伊朗建設成爲“新日本”。第二，在布熱津斯基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期間，美國迫使日本撕毀與墨西哥達成的以技術換石油的協議，向日本汽車放開美國國內市場。一九七七年德累斯納銀行約爾根·龐托 (Jurgen Ponto) 和一九八九年德意志銀行阿爾弗雷德·黑爾豪森 (Alfred Herrhausen) 遭到暗殺，就是這一英國政策在德國的表現。這一情況在日本也有出現。

9.漢密爾頓的報告重新出版于 Nancy Spannaus and Christopher White, editor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nd ed. (Washington, D.C.: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1996)。